

试论“文人论政”的流变

——以报人的自我期许为中心

朱至刚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以知识分子报人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认知做为观察的切入点，考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报刊理念的流变脉络及其历史成因。笔者认为从戊戌时期到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知识分子报人对自身及其报刊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评估，呈现出持续下调的趋势，这也是知识分子在社会格局中不断边缘化的现实表现。

知识分子报刊是近代中国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论者多将它们的报业理念归纳为“文人论政”。^[1]从《时务报》到《观察》的历代知识分子报人，确实都是以外在于体制的“文人”身份来评议国事、公务。然而以他们对“文人”和“论政”的具体构想作为切入点考察，则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知识分子报刊理念的逻辑前提和构成内容都在发生着结构性的流变。

一、“文人”何以“论政”

梁启超、汪康年；张季鸾、胡政之；储安平以及曾经同属知识分子报人的章太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的主张、出身、经历、归宿都颇有不同。然而，就从事知识分子报刊时期的他们而言，却也有基本的相同之处。就政治身份而言，虽有较为明显的政见倾向，但却没有固定的党团身份，或者所属的政团原本就组织松散，无力有效约束成员的言行。在经济方面，虽无恒产，但是也不至于必须依靠投身报业来维持基本生活。他们不仅对现实的社会状况和社会秩序颇有不满，而且都自信已经找到了济世良方。所以与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

子相比，他们又都具有更加强烈的进取姿态。然而，或是出于自愿或是迫于无奈，此时的他们又都缺乏直接运用公共权力和商业资本来进行社会动员、践行自己理念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为济世而入世，就只能诉诸包括报刊在内的文化途径了。^[2]

正是因为有这些相同之处，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报刊才会遵循“文人论政”的运作理念和模式不绝如缕。但这些做为知识分子的报人对自身在整个社会中应该处于怎样位置的判断却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各自的自我定位、期许，面对社会的姿态迭次更张。也就是在变与不变的相互交织中，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报刊及其理念才会呈现出基本连贯而阶段明显的发展谱系。

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报刊中。《时务报》最早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影响；新记《大公报》延续时间最长，也最富时誉；《观察》则是个中殿军。这三组报人也都公开披露了志趣，它们分别是梁启超撰写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张季鸾撰写的《本社同人之旨趣》储安平撰写的《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与《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这四篇文献分别面世于 1896 年、1926 年、1946 年，都是整个社会正为往何处去而忧虑蜕变的转折关头，它们较为典型地展示了彼时彼刻知识分子报人的报业观念。

二、第一代的“文人论政”：以“完整良好”自命

《报馆有益于国事》早就是传播思想史上常

被提及的经典文本，历来论者多将其主题概括为“耳目喉舌”论，也就是因为报馆可以在公共事务中起到“耳目喉舌”的功用，所以能够有益于国事。但如果仅此而已，还不足以说明报业在社会中存在的必要性，报业能够充当耳目喉舌并不等于只有它才能承载这一功能。《报馆有益于国事》所论及的范围也并非仅此而已。梁启超在此文中还阐明了另外三项观点。第一、国运之所以沉沦如斯，正是因为“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3]所谓“吏”与“儒”正是传统的社会信息传输中枢。既然他们都已经不能胜任耳目喉舌之责，那么也只有另辟新径。第二、报业能够承载的社会信息无论就覆盖面、涉及面、总体数量、分众精度而言都非其他传播方式可比，所以它在诸多可能的耳目喉舌中必然处于首要位置，所以也就应该被格外地重视。换句话说也就是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依赖报业而为耳目喉舌，不仅在理论上可行，而且是现实中的首选。第三、列强崛起的经历已经充分说明报业有益于国事的程度非同泛泛。“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4]在此时的梁启超看来，报业的兴起不仅是国事复振的必要条件，而且还是充分条件。报刊本身就能独立充任推动国家风气渐开、徐图自强的重任。报馆和社会其他部门之间是单向的自变与因变的关系。只要造就了理想的报馆和报刊，理想社会的出现就可以水到渠成。

在《知新报》叙例》中，梁启超更进而认为报刊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所有信息需求，它对社会的干预、指导、影响就应该是全方位的。也就是所谓“东西各国之有报也，国家以之代宪令，官府以之代条诰，士夫以之代著述，商业以之代学业”。^[5]但是此时国内的报刊数量已经不少，何以国势却不盛反衰？梁启超也对此做了解释，那就是必须像泰西大报那样全面而及时地反映和干涉社会现实，才算得上是理想的报刊。即使暂时力有未逮，至少也要做到“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旁载政治、学艺要书”^[6]而在撰写该文的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为止，国内能够做到在他看来是底线要求的报馆尚付阙如。

梁启超在1901年的《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对这种全能报刊观做了进一步的提炼充实。他认为只要是“完整良好之报”就能做到“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7]单就字面上来说，在该文中提出的报业标准并不出奇，然而它们的含义却并非如此简单。在梁启超那里，必须要做到“能以国民大多数之公益为目的”才算上宗旨定而高；必须要做到“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并且所全力鼓吹的还要是对国家民众“最有利而无病者”才算得上思想新而正；必须要做到“能使人阅报而全世界之智识无一不备”，而且要让读者“阅一字则得一字之益”，无任何疏漏缺陷才算是“材料富而当”；只有同时在这四方面做到尽善尽美，才算是报纸称得上完整良好的必要条件。因为是以“完整良好”为衡量标准，在一人之报、一党之报、一国之报、世界之报之间的高下也就不言自明。这不仅是就报刊本身的规模而论，更重要的还在于能够从中直接受益的人群范围截然不同。报刊在四种状态间的演化也就是趋近乃至达到“完整良好”因而无所不能的次第阶梯。正是在这样的评价体系驱动下，梁启超才会在《清议报》风头正劲之际，就试图将在他看来正介于一党之报与一国之报的《清议报》改造成为完全的一国之报甚至世界之报。^[8]也正因为以一国之报自任，《新民丛报》才会创办伊始就公开声称“本报一以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9]

当然以今日眼光看来，无论是就行业在社会构成中的实际位置还是从业人士能够具有的实际能力而言，包括传媒业在内的任何行业都只能是社会有机构成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当然的全能中枢。完整良好所以无所不能的报刊、报业、报人根本就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然而在梁启超漫长的用世历程中，他对社会环境的认知都正可以向他的全能报刊观念提供足够的支撑。在各种因素中，最重要是的对社会环境的认知，而个体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又以对他所属群体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认识最为重要。梁启超活跃的年代大致是从1895年公车上书到1924年退隐清华园。这30年正是知识分子的实际作用与自我期许高涨的时期。此时的知识阶

层眼界大开、门面日宽。清廷和北洋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操控能力又相当孱弱。既然在这一时段内，没有任何人物或者组织能够兼为君师，那么出而充任救亡与启蒙的主导就被知识分子看做是责无旁贷的任务。现实状况却又在相当程度上可为他们的自许提供背书。就此时知识阶层的观念世界而言，虽然知识构成有了明显变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在“五四”以前还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和推崇，这就使得在知识阶层内部能够维系较高质量的相互认同。就这段时期的政坛格局而言，满洲贵胄的传统优势早已土崩瓦解，北洋人物原本就是文武参半，而且即使是军人领袖也都多少有几分士人色彩，全能式的政党也未兴起。无论从直接还是间接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对于实际政治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处在南宋以后最为强劲的时期。

从维新到保皇，再到立宪与革命，这一系列的社会运动都是由知识分子主导。只要有利于救亡启蒙又不违背士人风范，就大可根据当下的需要因势利导地展开各项活动。在各种社会身份中来回转化或者同时身兼数职在他们那里既不存在观念立场的转换问题，也并无多大的现实障碍。朝堂官员、报馆报人、学堂教师、学会会员、书坊商贾甚至于帮会中人、杀手刺客在他们看来也不过就是从属和服务于知识分子底色的随缘应化而已。而就报业在社会变革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而言，自命为全能至少不见得比其他行当更加缺乏底气。换句话说，从清末立宪到北洋时期，只要能够成为知识精英，就有相当大的可能通过对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掌控成为政治精英。章太炎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向来没有掌握任何的军权和财权，参与同盟会和共和党的时间也都很短暂。但是，因为被公认为学界祭酒和革命文豪，所以在民国初年的政坛上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再如以梁启超、蒋百里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系，也从来没有掌握有形实力，组织也很不严密。但是，因为派中要角都是知识精英，所以常以看似超然的身份在政局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及其同辈对西方报业，尤其是被他屡屡提及的“泰西大报”的认识实在还在浮光掠影的层次。例如他曾在《〈萃报〉序》中写道“闻之泰西诸国之报，国以万计，省以千

计。城市以百计”。^[10]实际上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没有任何西方国家的报纸数量达到了这样的水准，这当然跟他们对欧美社会并没有多少直接体验有密切的关系。还是以梁启超为例，他在戊戌之后流亡海外十余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就是在日本。此时的日本还远未如后来那样全社会都被军国主义直接掌控，报界不仅规模在持续扩张，而且批评政府、指导社会的勇气和能力还在增长，所以梁启超才会认为日本的报刊在趋近完整良好的程度上远胜于中国。然而日本又不如泰西却又是众所周知的共识，因此对日本报刊的长短之处相当熟悉的梁启超才会略有几分想当然地认定泰西大报又要远为胜出。唯其是浮光掠影，而且是经过日本现状的折射，泰西大报的光彩对于梁启超等人才会格外地炫目动人，以至于会自然而然地将它们看做是足以证实“完整良好”的报刊不仅可能存在确乎存在的依据。既然在别国都已经出现，“完整良好”之报在中国是否也可能出现也就不足以成其为疑问了。

这种认识的延伸下去，自然会认定主持报刊的人士当然应该就是社会的核心人物。在这样的语境下，“文人论政”实际上就是为“文人主政”做前期准备。也就是所谓“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11]虽然在《时务报》创建的 1896 年，以汪康年、梁启超、严复、熊希龄、唐才常等人为代表的报人们至多也就是后辈名士而已。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将我辈看作是“茫茫宇宙，共有几人”，是在近在眼前的变局中必然会主宰气运的不二人选。^[12]其他所有人物哪怕是现居高位也好，科甲前辈也罢，举凡是在国人之列就当然只能唯他们马首是瞻。他们的报刊活动既然是在这样的身份设定中展开的，那么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将报馆同人和全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设想为启蒙与被启蒙、教导与被教导、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如此一来，在应该传播什么信息，应该以怎样的方式传播乃至至于具体到应该怎样措辞用语等等方面，当然就只能完全听由报刊编辑部来圣明独断，读者乃至所有不被看做是同道中人的人士就只能毫无保留地全盘照收，而且还应该在醍醐灌顶之余起而行之。

如果对报刊的编辑方针表示了质疑,那么就足以证明是下愚而不可移之辈,遭受奚落就是咎由自取了。例如在《时务报》创办初期,缪荃孙曾善意地建议梁启超不要过多地提及自己的学派观点,梁启超虽然原则上承诺“不以所学入之报中”,但同时也很不客气地讥讽了缪荃孙自己的学术旨趣与倾向,甚至缪荃孙在目录与考据方面的专长也成了被鄙视的对象。^[13]既然报业本身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中枢,在现实世界中充当“政府之监督”与“国民之向导”。那么报人就理应是整个社会的当然领袖人物,当然必须以极高的标准来严格地他律和自律。他们必须在志趣、格局和才具上都必须大有过人之处才足以胜任这样的重任,梁启超多次对同业诸君提出号召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全能报刊观念的秉持始终伴随着自己就可能造就,或者至少是做为重要人物参与造就“完整良好”报刊的自许。这种自许其实也是知识分子对自身在社会格局中以当然领袖自许的缩影。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商业资本与党派组织力量与影响的增长都远远快于知识界,知识界再也难以维持当然领袖的自我想象。投射在报业的变化就是在日渐强势的商业报刊与党派报刊面前,还要坚持营造超越于任何利益之上的全能报刊不但早就难以践行,而且即使做为知识分子的自许也已经不合时宜。知识分子报刊的理念也就需要顺应时代和局势的变化进行调整。代之而起的知识分子报刊模式就只能是自处于任何利益群体之外而非之上。1924年,梁启超也终于心灰意冷,宣布与报界和政界永别了。

三、第二代的“文人论政”:以“纯粹公民”为理由

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向富盛名。然而何以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次序?何以会出现在1926年?这仅是事件的偶然,还是反映了局势乃至结构的必然?《本社同人之旨趣》对报业应该是什么、报人又应该是什么做出了很明确的回答:报人是纯粹的国家公民;报业的天职是“绝对维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14]由于使用的都是全称判断,所以这里的

“是”其实也就等同于“只是”。所谓“纯粹的公民地位”正可以理解为在《大公报》同人看来,报人既是公民,然而同时也只是公民,报人的职业身份是其公民身份的从属。报人的报刊活动是基于而且只基于他自身的公民权利得以在法理上成立。

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四不”究竟是什么意思,而且会被同时提出。所谓“不党”不仅指报人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同时也包括不视自己为政治权威。报人无需听从政团组织的号令,但是也没有向政团发号施令的权威与责任。政团也就无须唯报社的是非为是非,唯报社的意见为转移。正因为报社既不在政团之下,同时也不在政团之上,报社才能真正做到原则上对所有政团一视同仁。对所有涉及到政团的新闻事件都以是否利于国家为唯一标准,就事论事而不带任何成见,不是借题发挥,更不是借机清算历史旧账。正也就是所谓“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15]

同时,既然所有国人都是公民,那么报人不仅与政治人物,而且与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处于平等地位。报社、报人在社会传播中所拥有的优势就只是履行职责所需的职务需要,而非排他的垄断权力。所以报社才绝对不能凭借在社会传播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来为自己寻求不正当的经济利益,“不卖”因此就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报人的言论资格是以公民权利为充要条件,那么也就意味着只要拥有公民身份,通过报刊发表言论也就自然是每个社会公民的应有权利。因此将言论版面“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共喉舌”的“不私”才成为必要。^[16]最后,既然报人本来就是社会的普通份子,他们既非圣哲亦非愚人。报人在具体问题上的见解也就不见得总比其他社会成员来得高明。所以“不盲”才既足为报人所自诫,也可为报人所自勉。除了报人自己以外,任何个人与群体也都未见得都是真理的绝对代表,所以才必须同时有“业言论者,宜不媚强御,亦不阿群众”的理性与冷静。^[17]概而言之,“四不”方针所反映的正是大公报人对报人、报刊、报业应有社会

职能的认识，那就是在“纯粹公民地位”的基础上谨慎切割“论政”与“主政”。报人以纯粹公民身份论政的权利固然不能放弃，同时明示不谋求因此而取得社会的领导地位。胡政之在1947年对当年的报刊观念进行了再度说明：“我国过去的报纸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专为表达所属政党的政治主张；一派则完全着眼于生意……我认为一份理想的报纸，要兼顾事业与营业。营业能独立，始能站在超然的地位，不为他人所左右……至于以报纸为一事业，在新闻界中还是一种革命运动，不偏不倚，包罗万象，完全取客观的态度，对任何党派都是一样……报纸的任务，应该是民众政治教育的工具，但绝不是自组政党来提出自身的主张”。^[18]只求论政的意思就表述得更加清楚了。

其实公民的基本权利原本就不应该只包括议政，而罔顾参政与主政。大公报人明确表示以不党、不私为基本立场当然可以被看作是超脱。但是这种超脱究竟主动地自居淡泊，还是被动地自认边缘，也只有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才能看得更为真切。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在1926年所以都是在野之身，各自都有几分不得已。胡政之与皖系的关系非同泛泛，他在1920年被迫离开大公报社，南下创办国闻社，正是因为此时战败的皖系虽然失去了对北京的控制权，但是仍然掌控着浙江和上海。1925年胡政之离沪返津也应当与江浙战争后，上海也成为直系的地盘有相当的关系。张季鸾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但在主持国民党系统的《中华新报》时也因为党内派系斗争的影响被迫离去。至于政客和商人的成色远远大于报人的吴鼎昌，更是一开始就将办报视为藉以养望、重返政界的终南捷径。

相对于个人际遇而言，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社会的总体状况，尤其是政治精英的产生机制在1926年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此时的国共两党都已以俄为师，建立起了完整严密的组织体系。它们在政治舞台上固然已经举足轻重，在思想领域也已经逐渐取得强势地位。民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的思想倾向基本上已在两者间非此即彼。北洋系统相应地也在试图通过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来维系摇摇欲坠的统治。“赤化”与“反赤”之间针锋相对的角逐

日益白热化和极端化。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的初期又相当热衷于全面推行“以党治国”，并没有给党外人士留下多少从政空间。知识分子既不直接掌控公共权力和经济力量，又没有组织的整合，各自为政，自“五四”以来内部又因为立场和观念的差异而日趋分化。在这种情势下，他们不仅在政治舞台被明显地边缘化，在文化领域内的可选择空间也在被逐渐地压缩。知识分子的整体被边缘化已是大势所趋，每个个体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如果要想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或者保持影响，就必须将首要身份转化为政治人乃至党派人。如果要继续保持独立的超然地位，那就意味着要以进一步被国家权力所疏离为代价。《大公报》始终宣称报业的天职是凭借公民身份通过报刊来议政，要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保持独立，而且规定大公报人不得兼任有薪俸的公职。这些做法当然都可以看作是大公报人的高蹈独步。然而所谓“天职”云云也可以视为必须这样做，而且只能这样做。从社会秩序的角度着眼，“四不”既张扬着知识分子在精神世界的崖岸自高，也流露出在现实政治中被边缘疏远的无奈。

由此可见，当被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本报同人之旨趣》实际上体现的是《大公报》人乃至独立知识分子在弱势地位下的以攻为守，是在自行承诺从此退出主导中枢，以不谋求参政、主政为代价来换取能够继续议政。此时的“文人论政”已经不再是为“主政”做前期铺垫，也就只能是论政而不求主政而已了。这种对现实政治的超脱态度在1927年以后的知识分子那里相当普遍，也常为隔雾看花的旁人、后人所乐道，然而其中况味如何，那就真是如人饮水了。

四、第三代的文人论政：是且仅是“我们的态度”

1927年以后，国家和政党的力量不但在有形的政治、军事方面日益膨胀，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影响也在持续地扩张，知识分子在政治体制之外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地压缩。然而直到40年代中期，社会也并未完全被调伏，独立的知识分子报刊还能以如新记《大公报》那样公民报刊模式存续绵延。但是当社会的组织化趋

势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时候,知识分子在社会体系就连要自外于体制都相当困难。他们不仅对国家大政已经几乎完全没有实际影响力,而且在两极对立之外表达自己观点的空间也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新记《大公报》曾经迅速崛起,为各方人物都不得不推崇忌惮,但是此时的王芸生等人已经是左右交迫。正因为自外于激烈的极端对立也几近奢望,此时创刊的《观察》才会格外强调他们办刊的目的仅只是为在杨墨之外的人士提供个共同说话的地方。^[19]《观察》同仁广泛地约请特约撰稿人,其实也可以看做是此时的编辑同人已经没有独立担当舆论领袖的能力和自信。只有将这些特约撰稿人的社会影响力集聚起来,才能做到让他们集体所发出的声音能够被传递到一部分知识分子那里。可以说在《观察》那里,不仅“文人”只能论政而不主政,而且对所论政务的意见也只能自认是且仅是“我们的态度”而非必定就是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

也正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自许甚至是自信,《观察》同人对报刊应该是什么,知识分子报刊又应该是什么的回答始终是既甚为谦逊,又有所回避。梁启超那代的全能报刊观和张季鸾那代公民报刊观对“报刊应该是什么”作出的判断都既明确而又全称,在他们那里只有与自己的构想相符才算得上是合格的报刊。然而,《观察》同人却并没有这般唯我道方正道的自负,他们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与《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这两篇纲领性的自叙中,自始至终采用的只是诸如“我们认为”、“我们应该”的口气。《观察》同人既没有居高临下地俯视整个社会,也没有月旦报界与出版界的状况。“我们”之所以要创刊《观察》的目的是“今日中国实极需要有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出而说话”。^[20]然而需要这样的刊物并不等于只需要这样的刊物,只能允许这样的刊物存在;也不等于这样的报刊就必定比其他类型的报刊具有更高的存在合法性。需要这样一份刊物也并不等于《观察》同人有任何义务来创办这样一份刊物,更不等于只有《观察》同人才能够创办这样一份刊物。对于储安平等人而言,创办《观察》并且把它

办成如此面貌更多地是出于自我的选择,而非出于社会的必需,更不是出自舍我其如苍生何的自许。这也正是此时在面对新一轮大变局时,知识分子根本无力主导的真实写照。

结语

从《时务报》到《观察》,在它们对报刊应该是什么,报人又应该是什么的回答中,知识分子及其报刊在这五十年间社会地位从中心到边缘,群体心态从高度自许到甘居江湖的演变轨迹呈现得既脉络分明又阶段清晰。到了1949年以后,所有大陆的知识分子都成为了既有物质生活保障又受到组织纪律约束的单位人。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舍此无其他可以维生之计。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自外于体制之外的报业理念也就最多只能是观念而已了。然而正是因为后来的研究者大多早就习惯了组织人和单位人的生存方式并且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思维模式。在这样的观察视角下,无论是褒扬还是批评,知识分子报刊的理念才会显得如此的非同寻常。也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知识分子报刊都非同寻常,所以才会密切关注他们都是以文人论政这一共同点的同时,在不经意间忽略了大体相仿背后的颇不相同,以及造成这些颇不相同的历史成因。

作者: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注释

[1] 李金铨先生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一文中认为文人论政是近现代中国报刊的特征,它们“一方面延续儒家自由主义的传统,以天下为己任,以言论报国;一方面代表转型自由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他们莫不希望建立现代的“道统”,促进和监督权力中心的政统,以追求国家的现代化为目标”。(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0页)笔者认为这一见解诚然看到了“文人论政”在思想理路上来源的双重性,但是对于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究竟是由怎样的文人来怎样地论政的描叙却稍嫌模糊。

[2] 例如汪康年对《时务报》投入极大热情与努力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他规划中的中国公会做前期准备。(参见邹代钧致汪康年第九函,见

-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639页）
- [3] 《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66页。
- [4] 《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66页。
- [5] 《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144页。
- [6] 《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66页。
- [7] 《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476页。
- [8] 《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480页。
- [9] 《新民丛报章程》，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72页。
- [10] 《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130页。
- [11] 《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480页。这些设想在1901年的梁启超笔下这不仅是理论中的应该，而且已然在历史中出现。他在这里举的例子有“美国禁黑奴之盛业何自成乎？林肯主笔之报馆为之也。英国爱尔兰自治案何以通过乎，格兰斯顿主笔之报馆为之也”。（《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482页）当然，以现在我们对英美史的了解来看，梁启超至少也是把其中的因果关联简单化了。
- [12] 语见邹代钧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589页。
- [13] 参见梁启超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845页。梁启超在该函中宣称“缪小山来书，舍弟节其大略来，已阅悉。弟之学派，不为人言所动者已将十年。然请告缪君，弟必不以所学入报中，请彼不必过虑，不然《书目表》后之文早登报矣。所以不尔者，自信吾学必行，无取乎此，不徒为入之多言也。若夫吾之著书，则彼乌能禁我。今直恨所著之书未成，刻书之资未充耳。他日鄙志苟逮，则将然成巨帙，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缪氏抢地呼天，又悉益乎？考据之蠹天下，其效极于今日。吾以为今天下必无人更敢抱此敝帚自炫者，而不意缪氏犹沾沾然志得意满，谓其字字有来历也。此等人吾亦以待林乐知之法待之，我固不与之较，彼亦无如我何也”。
- [14] 张季鸾：《本社同人之旨趣》（《大公报》1926年9月1日社评），转引自《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49页。
- [15] 张季鸾：《本社同人之旨趣》（《大公报》1926年9月1日社评）转引自《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49页。
- [16] 张季鸾：《本社同人之旨趣》（《大公报》1926年9月1日社评），转引自《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49页。
- [17] 张季鸾：《本社同人之旨趣》（《大公报》1926年9月1日社评），转引《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49页。
- [18] 胡政之：《对天津馆编辑部同人的讲话（1947年7月21日）》，转引自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371页。
- [19]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观察〉储安平言论选》，1957年内部发行本，20页。
- [20]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观察〉储安平言论选》，1957年内部发行本，20页。

54 *Bullet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News in Han Dynasty*
Huang Chunping

Bulletin was an important medium used to spread government news to society by the Han Empire. It released news such as the decree for the country, the royal family events as well as some major social news. News-oriented, missionary, guiding and calling to action were the main mode of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medium. Empire at that time utilized it to communicate the Government's main news and to guide public opinion. This medium had a strict review process and a variety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methods. Such medium was essentially within the scope of bulletin rather than the ancient Di Bao.

63 *Evolution of "Intellectuals on Politics" and Journalist' Self Expectation*

Zhu Zhigang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volving route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press idea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with discussions of their self-awareness towards their social statu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journalists' evaluation to the social status, the roles of the press and themselves show a continued downward trend throughout the period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to the late 1940s which also reflects the realistic forms of the intellectuals continuing marginalization among the whole social structure.

70 *War Reporting: A Study of American Women Journalists who Came to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7 - 1945)*

Zhang Wei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ole of the American women journalists who came to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including their backgrounds, motivations and the contributions. The paper suggests three categories of women journalists can be divided in the period, respectively radicals, free-minded and professional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despite that there were hug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women war reporters, they all contributed to the cause of Chinese war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nd reflected the war image of China. They achieved the great contribution and demonstrated the similar heroism like the men journalists did.

78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New Media Events*

Han Min

The new media event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It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 ordinary people's self-empowerment and their participation